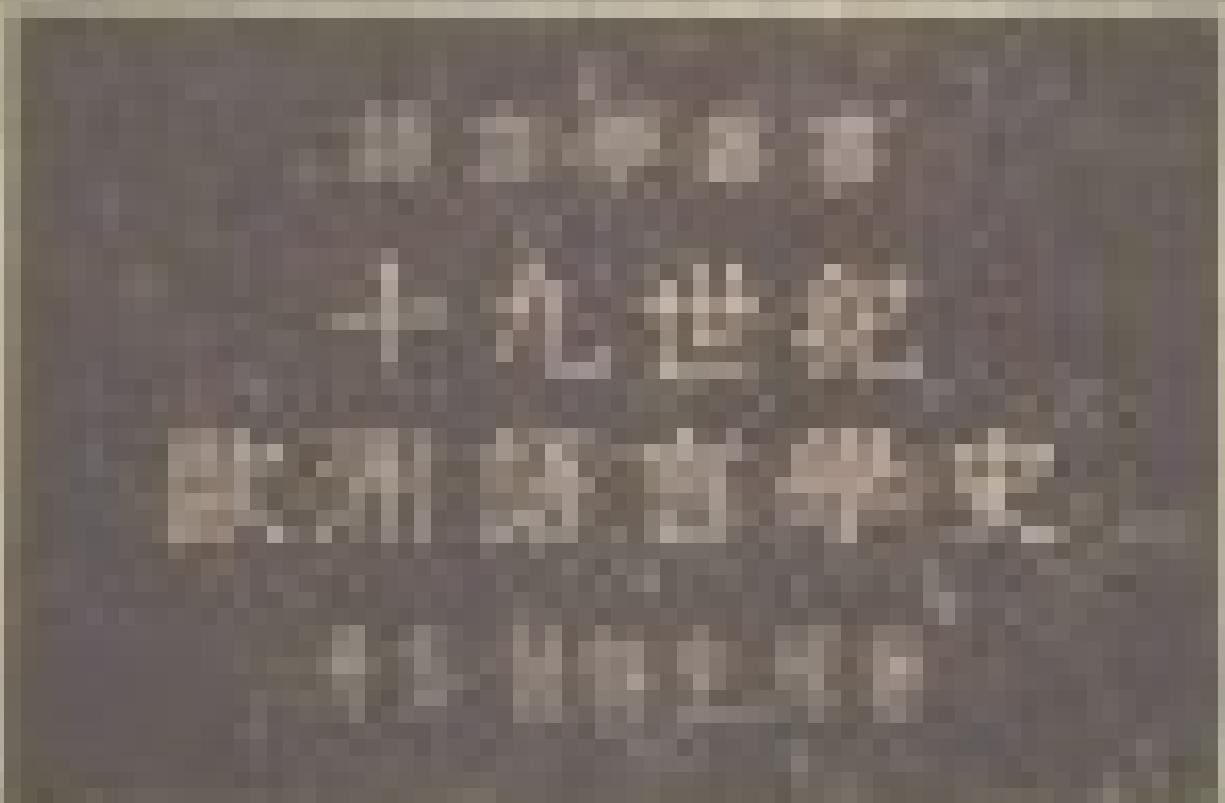


書叢言語

十九世紀學史
歐洲語言

丹麥裴特生原著



語言學叢書

十九世紀歐洲語言學史

丹麥 裴特生 著

錢 晋 华 譯

科学出版社

1958年5月

HOLGER PEDERSEN

LINGUISTIC SCIENC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1

內 容 提 要

這本書對於近代歐洲語言科學的發展、方法和成果作了綜合的敘述。“引論”扼要地介紹了歐洲古典時代，中世紀，十六、十七和十八世紀的語言學的衍進。語言發展規律的歷史概念，特別關於語言間的親屬關係這一概念，到十九世紀初叶才開始建立。第一到第四章敘述印歐語系各个語支的研究經過，第五章敘述印歐語以外的世界各个語系的研究情形，第六章敘述碑銘與考古的發現促進了文字史的探討。這六章系統地說明了語言材料的累積和分析是這門科學得以發展的基礎。第七章討論比較語言學的方法及其演進。末了一章敘述各學派如何從語言學的証據來推測印歐語系史前時代的種族來源、遷移分布的路線和文化特征。

十九世紀歐洲語言學史

丹麥 裴特生 著

錢 晉 華 譯

*

科学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陽門大街117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61号

中國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總經售

*

1958年5月第一版 書號：1122 字數：269,000
1958年5月第一次印刷 開本：850×1168
(京)0001—1,775 印張：11% 指頁：8

定价：(9)2.20元

原著版本介紹

“十九世紀的語言科學：方法和成果”一書的丹麥文原名是 *Sprogvidenskaben i det Nittende Aarhundrede; Metoder og Resultater, 1924* 年出版于哥本哈根，是 Aage Friis 主編的十九世紀叢書 (*Det Nittende Aarhundrede*) 第十五種。作者 Holger Pedersen 教授是西歐著名的比較語言学家，關於克爾特語和吐火羅語有過專門著述。現在的漢文翻譯所根據的是 *John Webster Sparre, 1924. Linguistic Science in the Nineteenth*

目 錄

引 論	1
(一) 蛮荒的古代	1
(二) 基督教。中古时期	5
(三) 十六和十七世紀	6
(四) 十八世紀	10
(五) 十九世紀	13
第一章 印度和伊朗古代文學語言的發現	15
(一) 印度語	15
(二) 伊朗語	22
第二章 近代歐洲諸大語羣	28
(一) 日耳曼語	28
(二) 斯拉夫語	42
(三) 克爾特語	52
第三章 立陶宛語、阿爾巴尼亞語、 阿爾明尼亞語	63
(一) 立陶宛語	63
(二) 阿爾巴尼亞語	67
(三) 阿爾明尼亞語	73
第四章 古希臘拉丁語研究的繼續	77
(一) 古典語文學	79
(二) 希腊語	82
(三) 拉丁語	90

第五章 非印歐的諸語系的研究	96
(一) 歐洲四圍的外系語言	99
(二) 印度四圍非印歐系的諸語群	122
(三) 更遠的非印歐系的諸語群	127
第六章 銘文和考古發現。文字史的研究	135
(一) 楔形銘文所代表的諸語言	143
(二) 象形文字的領域	160
(三) 閃語字母	170
(四) 閃語字母較遠的支裔	182
(五) 使用希腊字母的一些國家	198
(1) 希腊古文字的發現	198
(2) 其他民族采用的希腊字母	203
(六) 拉丁字母的支裔	223
第七章 比較語言學方法論	234
(一) 方法的发展概況	234
(二) 早期的比較語言學	244
(三) 比較語言学的新时期	275
第八章 印歐人的語言親緣關係,家鄉和文化	308
附 錄 專名索引	340

引　　論

歐洲的語言科學，直到十八世紀末叶，還沒能在古希臘羅馬人已經獲得的語言學知識上有多少進展。不錯，在克服古人的缺点和錯誤上，早已逐漸地有了向前發展所必備的一些因素，然而這些因素並不發生什么作用。土壤是准备好了，可是非得等到十九世紀，才長得出青枝綠葉來。

(一) 蛮荒的古代

古希臘人愛好追求知識，想了解存在的各个方面，這一特点自然地導致他們對語言作出哲學的探討。他們從自己的哲學出發，進而從事于語言的論述，加上古文獻的細心研讀更推進了這個論述工作。希臘人所創造的，羅馬人接受過來。希臘人給語音、詞類和詞尾變化起的名詞，都翻譯成拉丁語，又從羅馬人的手里傳遞給中古和現代的歐洲，生動地證明了希臘對語言科學的貢獻。

可是希臘人——或羅馬人——深入追究詞語的起源或語言間的關係時，他們就不免走上了歧途。

~~因為他們沒有其他的材料，他們不可能對語言間的親緣關係有清楚的觀點。~~希臘文學里有許多不同的方言，可是這些方言間的差別太微小了，不能激發深刻的思考；至于外國語的研究，對古希臘人來說是不感興趣的。的確，羅馬人由於崇拜優越的希臘文化，曾

孜孜不倦地学习和研究希腊文；可是“野蛮人”的語言大都沒有文学，按照希腊或罗馬的文化傳統，都是不屑研究的。如果一个希腊人或罗馬人懂得一点兒某种“野蛮”語言，那是純粹偶然的事；而他在这方面的知識受了古时代書籍出版条件的限制，也始終只能是他个人的私产。詩人奧維德(Ovid)从罗馬放逐到多瑙河河口南面，也就是現在客斯旦沙(Costanza)城所在的地方，于是他有了机会学习当地居民的語言——这个机会也决不是他所愿望的。这些居民叫做盖太(Getty)，是一个色雷斯(Thracian)部族，他們的語言是現代学者求之不得的乐意更仔細地了解的，它会帮助解决巴尔干半島和小亞細亞之間語言轉移情况的許多問題。奧維德用盖太人的話寫了一首詩頌揚奧古斯特皇帝(Emperor Augustus)，表現了他的語言学家的才能。我們惋惜这首詩沒有留傳下來，但它的失傳是不可避免的。誰肯操心去保存或抄錄它呢？罗馬人沒有誰看得懂，盖太人也沒有誰理会它。然而古代的确有过一些人，由于卓越的語言才能，掌握了許多不同的語言。正如十九世紀有一位主教叫梅左凡蒂(Cardinal Mezzofanti)，他能跟任何來到罗馬的旅客用他們自己的家乡話談天，可是尽管如此，他对語言科学并没有作出任何有价值的貢献；同样，公元前一世紀也有一位大家佩服的語言学家，旁托斯的米色雷德大王(King Mithridates the Great of Pontus)，據說他懂得二十五种語言。他的王國在小亞細亞，古时候这片土地上的方言一定是异常紛繁的；高加索也是他权威所及的地方，至今仍以語言复杂出名。可是这样的知識仓库既不能通过書籍而流傳于当世，也不能用來为語言科学服务。古代尽可以有梅左凡蒂，但是沒有拉斯克(Rask)或包普(Bopp)啊。

所以无怪乎古代著作家对于語言親緣关系的訟訟都是極端幼

稚的。比如他們要是遇見兩個語言間相似的類型，照我們今天的方法就得設法說明它們是一個早已不存在的共同原始語言的後裔，可是他們想不出更好的方法，只能假定為互借的結果或者認為一個語言是另一個語言的淵源。因此他們把拉丁語認作是希臘語衰退的形式，而某些膚淺的觀察還產生了這樣的假設：拉丁語是从一個單獨的希臘方言，伊奧立亞方言，繼承下來的，伊奧立亞話曾通行於特羅伊(Troy)城附近的濱海地區，按照傳說，羅馬人的始祖伊尼亞斯(Aeneas)便是從那兒發迹的。更進一層，古代人也不覺得下面這樣的一個觀念有什么可反對的：那時還活着一個語言，也許就是其它一切語言的源頭。他們的問題是，只要知道所有的活語言裡哪一個是最古老的。赫羅多特斯(Herodotus)講過一個典型性的故事，敘述一位埃及國王怎樣來解決這個問題。他把兩個初生的嬰兒養育在聽不見任何人說話的環境里，這樣等到他們過了咿呀啼叫的階段，看他們頭一句說的是什麼。兩年以後，便聽得孩子們嚷道bekos。國王便查問這個詞在什麼語言裡有解釋。他打聽出在小亞細亞菲立基亞省(Phrygia)通行的菲立基亞語裡，這個詞當“面包”講，因此便認為菲立基亞語是最古老的語言。多么容易就建立起來這個幼稚的信念了，竟認為第一個最原始的語言還是當時存在的活的口語呢。這樣的見解就使語言發展這一觀念成為不可能，而只容許語言衰落這個概念。

對語言彼此間的親緣關係缺乏清楚的概念，倒並不一定妨礙在一個語言內明晰地掌握詞與詞間的關係。下面我們還要談到古印度人民，由於他們的語言結構非常明晰，對於分析一個含有完整意義的詞的組成部分和研討構詞方法，會有很大的成就。可是希臘語和拉丁語遠不如梵語的明晰，希臘人和羅馬人對於詞的分析也遠趕不上印度人。因此詞源科學在他們裡面沒有扎下根

來。單就詞源學而論，无论在詞形的分析上和詞義发展的判別上，或是在語音衍变的探討上，他們是缺乏任何方法的。在他們眼里，一个詞好象是一团杂揉在一起而沒有形体的东西。他們并不认真地想法判別哪是詞干，哪是形态变化的詞尾，哪是詞根和哪是派生的詞素。因此一个罗馬人就会想象 *vulpēs* “狐狸”，属格 *vulp-is*，实际就是“飛毛腿”，由 *volō* “我飛” 和 *pēs* “脚”（属格 *ped-is*）組合而成；*lepus* “兔兒”，属格 *lepor-is*，实际就是“捷足”，由 *levis* “輕捷” 和 *pēs* “脚” 構成。这位罗馬人沒有想到这些詞里面的詞干是完全不相干的。他决不会理解，他这套办法有什么可反对的。在 *pēs* 的偏格形式里把 *d* 丢掉，在属格里把 *d* 换成 *r* 变为 *leporis*，这并沒有使他感到有什么不妥呀。他任意捏造或輕易改換語音变化，可是从來沒有梦想到例証是必需的或者是可以应用的。如果要說明一項表面上近似可能的語义发展，他更觉得不需要什么例証了。怎么办都行，甚至于相信事物还可以用相反的性質來定名呐。例如 *bellum* “战争” 起源于 *bellus* “美丽的”，因为战争是不美丽的；*foedus* “联盟，和平” 起源于 *foedus* “丑恶的”，因为和平不是件丑恶的事。

象这类虛妄的語源解釋，隨便举几个例子，并不給人强烈的印象；可是这类例子层出不穷地可以叫人头晕眼花呢。有一件事倒是耐人尋味的，那便是柏拉圖寫对话时訟苏格拉底講出一大套惊人的語源解釋，真不知他是鬧着玩兒呢还是认真。如果柏拉圖的用意是开玩笑，那么別人对他的誤解可慘了，因为他的語源解釋被接受了，古时候还认为他是語源学的創始人呢。

古代世界給欧洲留下了一笔遗产，里面装滿了对語言史的誤解；欧洲的語言科学就揹着这样一个沉重的包袱，繼續了許久，直到語言知識的范围逐渐扩展，远超过古人的梦想以后。

(二) 基督教。中古時期

基督教的傳播在歐洲語言科學的歷史上標誌了一個階段。它開始擴大了人們對語言的視野。基督教摧毀了希臘羅馬文明世界和蠻夷民族之間的樊籬，在一向沒有文學的許多民族里創建了文學。

跟希臘人和羅馬人有密切關係的許許多多民族，沒有一個民族在古代非基督教的文化影響之下，曾建立起一個持久的民族生活的。實際上，他們所有的語言完全消失了（阿爾巴尼亞語差不多是唯一的例外），至多只留下一些簡短的銘文，這些銘文只能刺激，而不能滿足我們今天的好奇心。可是基督教一旦採用了一個民族的本土的語言來宣傳它的教義，那麼一個民族本土的文學就會發展起來，甚至在世俗文學里也往往很快地產生很有價值的結果。

這種新興的文學對我們的語言學知識有什麼重大的意義，是無須強調的❶。但是基督教所創造的這些新成果，當時並沒有推動語言學方法的改進，因為書籍出版和銷售的情形還跟以前一樣，不可能通過文學著作看到遼闊的歐洲語言世界。這時不是只有一個希臘羅馬語言的小圈子了，却發展了一系列同樣狹小的語言圈子。中世紀，一個學者懂得他自己的語言，他近隣的語言，和拉丁語。但是縱使他還知道一點兒希臘語，象愛爾蘭的學者們那樣，他也還是沒有可靠的基础來從事比較語言學的研究。

❶ 同樣，佛教對於近代語言科學也有很多貢獻（參看第六章論吐火羅語一節）。可是回教在這方面的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回教並不利用被征服的人民的語言而只使用寶劍的威力使他們歸化。可蘭經是不翻譯的，而必須讀阿拉伯原文。好些民族的語言因此不能繼續發展，不能一直保存到今天，是很可惋惜的。

究。研究只能按照老一套办法來進行。事实上，受着这些限制，也还东鳞西爪地做了一些有价值的工作。例如四篇語法論文，是十二、十三、十四世紀的作品，見于斯諾瑞 (Snorri) 的古冰島史話 (Edda) ①。其中最古的第一篇，以建議改良拼寫法为題，是一篇小小的卓越的語音学著作——是古北歐語发音的描寫，对于我們今天有很大的意义。中世紀也有几部个别語言的語法。但是中世紀并沒在古人最糟的弱点上有所改進。有些詞源解釋，原是極嚴肅認真地提出來的，可是比古代人所提供的就更荒唐了。例如：拉丁 *barbarus* “野蛮人”，属格 *barbarī*，被认为是个复合詞，由 *barba* “胡須” 和 *rūs* “乡下” (属格 *rūr-is*) 構成，“因为那些住在乡下的人長着粗胡須”，这么說，*barbarus* 就是“乡下胡子”，这个解释跟古代的詞源解释犯了同样的錯誤，甚至于更加嚴重，因为拉丁 *barbarus* 明明只是个希腊語借詞，所以决不能解釋为兩個拉丁詞的复合。

(三) 十六和十七世紀

印刷術发明了，方法停滯不進的致命状态終于結束了，比較有綜合性的觀察于是有了可能。要想认识語言与語言間和詞与詞間的親屬关系，这样的綜合性觀察是第一个先决条件。从这点看來，近代的初期是語言科学史的轉折点。希腊語的研究，在西欧經過整个中世紀几乎完全被遺忘了，这时有了复兴的机会；隨着美洲大陸的发现，語言世界的視野意外地展开了；这些，都跟以前的

① 歷史家和詩人斯諾瑞 (Snorri Sturluson, 1179—1241) 所寫的史話，指 *Younger Edda*，散文體，內容除神話和英雄故事外，有一部分專論古冰島 (北歐) 語言和民間詩人的創作体裁。老史話 (*Elder Edda*)，詩歌体，是較早的神話和英雄故事集。——譯者

几个时期形成并加强了顯著的对照。

这样材料的增加和視野的扩展所产生的效果很快地就顯示出來了。早在十六世紀，为实际生活需用而編寫的許多語言的語法綱要已經变得很普通，关于遙远的罕知的許多語言也有零散的記錄出版。一个恰当的例証是，法兰德斯人勃斯拜克(Busbecq)在1589年印行了关于克里米亞(Crimea)峩特語遺迹的註釋。十六世紀的后半期，好些人嘗試給当时所知道的一切語言作出概括的叙述。瑞士学者盖斯納(Gesner)在1555年出版了一部米色雷德①，司徒加(Stuttgart)的希罗尼模斯·梅格色(Hieronymus Megiser)在1592年印行了四十种語言示例，在1603年的第二版里数目增加到五十种。1599年斯卡列格(Joseph Justus Scaliger)把欧洲的許多語言分为四大群和七小群。他借用它們称呼“上帝”的名字給四大群命名为：deus-, theos-, gott- 和 bog- 語言，也就是拉丁語与罗曼諸語言，希腊語，日耳曼語和斯拉夫語。可是他簡直沒有引用任何語言材料來支持他的分类的正确性，而且他只把那些关系密切到迫使任何研究者无法忽視的一些語言計算在內。凡是只消下点研究工夫就能找到親緣关系的地方，他都遗漏了。他甚至用斬釘截鐵的口吻宣称这十一群語言里面彼此沒有任何親緣关系。如果他觀察到一些相似的特点——这是他无法避免的——他就一律解釋为借貸的結果，拉丁語借自希腊語，近代語言借自拉丁語——換言之，即按照文化的進展采取同样的方向。这样，他并没有擺脫古人对語言的非历史的概念。

一般地說，斯卡列格的态度很能代表十六、七世紀整个时期。有些觀察者在語言親緣关系的領域里作了些发现，可是他

① 舊名米色雷德，意譯可作“語言大全”或“世界的語言”。參看上文第一節“蠻荒的古代”。——譯者

們不知道从这些发现里面归纳出正确的结论。立陶宛人米家侖 (Michalon) 在 1615 年指出立陶宛语和拉丁语的亲缘关系。可是他得出的结论是，立陶宛人是意大利人，属于拉丁血统；另一方面，他否认立陶宛语和俄语的亲缘关系。他本能地觉得，立陶宛语并不象一般外国人所设想的是一种斯拉夫语言。他徹头徹尾地否认立陶宛语与俄语的一切关系，这种态度到很象斯卡列格的口吻。由于立陶宛语跟拉丁语有相似处，他就下结论说它是拉丁语的一种。米家侖从来没有想到从同一个早已不存在的语言产生了一系列平行的语言的这一正确概念。

以同样的精神，学者们轻易地就承认波斯语是一种日耳曼语。我们看见这个观念第一次出现在傅尔卡牛斯 (Bonaventura Vulcanius) 1597 年写的论冀特人的语言的著作里。他引证了許多词汇上互相符合的特点(一共举了二十二个例子)那是一个同行学者在一本用四种语言 (波斯语是其中之一) 互相对照的摩西五书里发现的。这些相符的词大多是正确的，但是也有好几个错了，例如用波斯语 Xuda① “上帝” 来比拟德语 Gott 和它的一些同源词。波斯语与德语有特别的亲缘关系这一概念在学者们的头脑里迷惑了二百多年。照当时的语言学见解来看，墨守这个结论省事得多，可是要用新发现作为出发点，把关于“彼此不相联系的”欧洲诸语群的那些流行观念，来通盘重新审查修订一下，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波斯语引起注意的那种纯粹偶然的作风是很典型的；谁也不肯细心钻研所有可以利用的全部材料来追究语言间的亲缘关系：学者们偶然碰上了什么，就觉得心满意足了。

然而他们对于许多“彼此不相联系的”语言的概念，也并不是总能满足的。相反地，他们往往梦想去追溯一切存在的语言都

① 这个词里 X 是舌根清擦音。

來自同一源流。他們經常企圖推定希伯萊語為其他語言的母語。當人們体会到希伯萊語實際上跟歐洲語言沒有任何相似時，這就難怪需要施行異常武斷的手法來“證明”這個理論了。例如隨意增減語音，用種種方式來顛倒次序和抽調替換。這個理論的一個主要倡導者解釋這些紛歧現象是起於下面的事實：希伯萊語是从右到左寫的，而歐洲語言是从左到右寫的！在希伯萊理論的名下所犯的最可笑的錯誤，也許會引起當時比較開明的一兩個人的一些懷疑；可是即便如此，懷疑也是從某種土生土長的常識出發的。在那個時期，用推理方式來反對這個理論，必然是談不到的。他們所遵循的方法大體上還是從古人繼承下來的那一套，只不過是應用在新的材料上罢了。他們在提到文字書寫的方向時，暴露了把書寫和口語完全混為一談的錯誤，這種几乎叫人難于置信的錯誤也未嘗不能引証古人的著作來互相比擬。對詞源解釋儘管有這樣或那樣的想法，可是這個假設总的說來是廣泛地被接受的。卓越的丹麥語法家沛特·西夫（Peder Syv）在辛帛立語略說^①一書（1663）里解釋丹麥語 barn “孩子”，侏特蘭語（Jutland）作 ban，是由希伯萊語 ben “兒子”變來的，以及諸如此類的說法。這樣，他為了擁護上面的理論，準備把語言史顛倒過來，把最近的斯干的那維亞的詞形當作最古老的了。

在這些錯誤的空想里，正如上述的語言學上的發現一樣，也都含有瞎碰瞎猜的性質。沒有誰实事求是地鑽進材料里去觀察一番，看哪一個語言能有比其它語言更古老的面貌。一個學者挑選了某个熟悉的語言，把它說成最古老的語言，所持的根據同語言學的觀察毫無關係，然後用他所繼承的一切顛三倒四的方法來証明他的論斷。根據象煞有介事的聖經上的論証，希伯萊語便經常被

① 辛帛立語（Cimbric）指丹麥語。

选为最古的语言。还有些人选择他们本土的语言。哥罗披烏斯·貝卡努斯 (Goropius Becanus) 認为荷兰语是最古的语言，还有其他类似的例子；按照当时流行的方法，不消說任何这类的理論的真实性都是可以說得头头是道的。

(四) 十八世紀

十八世紀出現了新的精神。破題兒第一遭，学者們越过了偶然的境界，不再滿足于把碰巧落到自己手里的材料胡乱地拼湊在一起了。破題兒第一遭，真正的研討发动了。語言間的親緣問題有了充分明确的轮廓，系統的蒐集材料也开始了。

著名的哲学家萊布尼茲 (G. W. Leibniz) 在新的发展里是个最突出的脚色。他毫不留情地攻击希伯萊語的假設，并反对各式各样的“哥罗披烏斯主义”；可是他也不同意斯卡列格关于“彼此不相联系的”許多語群的假設。根据当时所能得到的材料，并沒說明他所援引的知识的出处，他試圖建立一个語言系譜的綜合体系。他給这个体系寫成了一篇論文，刊登在柏林研究院集刊的第一冊，書名柏林研究院論文集(Miscellanea Berolinensia)，出版于1710年。萊布尼茲在这篇文章里認為大多数欧洲和亞洲的，甚至埃及的语言都是同一个原始语言的后裔。这一片被他当作一个整体單位看待的辽闊的土地，現在被我們分成五个到八个語系。这些不同的語系之間也許有某种親緣关系（看第八章），可是无论如何，萊布尼茲的分类顯然不是建立在徹底的分析上，而只是根据某种灵感式的直覺。他的知识不是求得的知识，而是一种先驗。关于这片广大領土的分类的主題，他作了好些有意思的觀測。他把波斯語放在与日耳曼語有适当距离的地位，毫不含糊。